
「開放社會」

的 敵人

蘇浩志 譯

「卡爾·波普」(Karl Popper)，一九〇二年，生於維也納，年輕時曾經教過數學和物理，也會是馬克斯主義者，但後來他對馬克斯主義的攻擊，被認為是凌厲無比、罕有匹敵的。這個人，在「方法學」上，有相當的貢獻。他出過好幾本書，其中最重要的是「開放的社會及其敵人」。

以下這篇文章是布萊恩·梅奇(Bryan Magee)寫的——是他「卡爾波普這個人」(Karl Popper)一書中，最後的一章。

在我的觀念中，「開放的社會及其敵人」（卡爾·波普所著的一本書，此為書名），今天講來，最切要的層面，就是它所主張的「社會民主」的這一個哲學。

這也是卡爾·波普寫這部書「開放的社會及其敵人」的立意精神。但當時他寫這本書，這點並不是最大的動機。大家總記得：他在忙著寫這本書的時候，正是希特勒打下一個國家又一個、深入蘇俄本土、幾乎席捲整個歐洲的壞日子。整個西方文明，緊急地，也就面臨了一個「新的黑暗時期」的威脅。

在這個環境下，波普所關心的，自然是去深入了解且闡述「極權觀念」，並且極盡能事地去扯它的後腿。波普也強力地宣揚西方風格的「自由」，是多麼重要及可貴。這種大力的揚傳，把「社會民主」的哲學，時空上，都推到了一個極廣的界域。

在波普主要的解釋觀點裏，他說「極權主義」所引用的，是一種社會心理學的「概念」——波普把它叫做：「文明的緊張」的概念。這個概念，波氏承認，是「佛洛伊德」在他的一本書「文明及其不滿」中所塑型的。我們常可「聽」到這本書宣稱：大多數的

人並不真的想要「自由」，因為自由涵括了太多的責任，而大多數的人，是害怕「責任」的。

不管這個說法，能否用在「大多數人」上，我能肯定，裏頭有一部份是真實的。在我們的人生裏，挑起責任，確實就是意味著：要不斷地面臨困難的選擇，以及做「極其難做」的決定；在決定錯誤、選擇錯誤時，同時也要去承擔後果。這是很重的擔子，並非危言聳聽。我們都有一種傾向，也許「嬰兒期」時就有了——我們都想藉口把重擔從肩上拿掉，並逃開這個壓力。總是，我們最大的本能就是求生存，而我們最大的需要，因此也就是「安全感」了。這樣看來，人們其實是老想把責任，推交給他比自己還更能信任的人或事身上。人們其實老想把不可避免而又艱困的決定——這種決定左右我們的一生——交給我們可以寄託、比我們堅強的人：如既嚴苛、又仁慈的父親；或者交給能教我們一些東西的「實用思想體系」，這個體系，自然是比我們自己要好些，它犯比較少的錯誤，或者根本不犯錯誤。

最重要的，人總是想從恐懼中解放出來。而各種恐懼：恐懼黑暗、陌生人、死亡、行為的後果、未來

等，根本上，大概就是在畏懼「不可知的事物」。所以，我們一輩子都在渴求一項保證，保證「不可知」的其實是可知的，甚至「不可知」裏，總包括著我們想要的東西。我們擁抱住宗教，因為它保證我們，我們其實不會死的；我們也擁抱住一些政治哲學，因為它保證，也許很快，這個社會就會變得更好。

在還沒有開放批評的社會裏，由於有權威、階級、儀禮、禁忌等，社會有穩固性，所以前面所說的種種需要，也就於焉存在。但因為民族形式的遽變，批評傳統的開始，一些新且「可怖」的要求就告出現了。人們開始懷疑權威，懷疑過去他認為理所當然的事。他們要替自己、替別人負責。於是，跟過去的穩定性對比，社會受到分裂的威脅，個人則受到方向大亂的威脅。因此導致一般社會方面，在個人內在方面（這也是佛洛伊德部份的觀點），一開始也就有了相對應的反動發生——我們用安全來「購買」自由，用自尊來「換取」平等，用心靈的平靜，來「求得」批評式的自我覺醒。代價太高了！沒有人會很高興地付出這個代價，甚至很多人根本就不想付出。希臘哲人對上述的「交換」的好處，本來是絕不表疑慮的：他們

在提到他們最偉大的社會批評者及質疑者時說：「做一個不滿足的蘇格拉底，比做一隻滿足的豬強多了。」但是，由於另一種反動的萌生，蘇格拉底却因為他的質詢而被處死。此一來從蘇氏的學生柏拉圖之後，就不乏非常出色的智者，反對社會「開放」了！他們希望復古，或者朝前走，目標總是向著一個更閉塞的社會。

所以可以講，在蘇格拉底之前的時代，「批評的思想」開始萌芽的時候，文明的發展就是正反兩面，雙軌地發展了。（或者更精確地說：反面的思潮蘊涵於正面的思潮之中。）反面的思想，為了對抗「文明的緊張」，一種是希望獲得如在子宮中的安全，回到氏族社會、未有批評觀念的社會；一種是希望向前邁進，到達「烏托邦」的世界。這種復古的想法和「烏托邦」式的想法，有相同的需要，它們關係良深。它們都想捨棄現有的社會，同時宣稱發現了更完美的另一種模式。這兩種想法都是劇烈的、而且是激情的，如果你認為這個社會，本就不怎麼好，日後却要變得更壞，你一定會阻止它「改變」。如果你自認為在建構一個未來的完美社會，當你得到時，你一定要它永

久保存下去。如此一來，「復古」又「烏托邦」的目標，同樣的都是一個閉塞的社會。既然「改變」只有在施行僵化的社會控制手段中能免除——如禁止人民在他們自創的意念下做事，因為這可能會帶來嚴重的後果——這樣兩者想法，都會導出「極權主義」來。像這樣的衍生，其實一開始就已經註定，但真正它發生時，人們總會說，那是因為理論被濫用了的緣故。我們真是常常聽到：反面的學說（例如最有效的政治形態，是獨裁政治。），或是「最完美的未來」的理論（例如共產主義），都是一種很好「理論」，只是不幸沒能在實際上實現而已。這是荒謬的。如果一個理論實際上行不通，那一定就是理論本身有問題。這不是別的，正是經驗科學的論點。

雖然「復古」（反動）和「烏托邦」的理論，在實踐上的結果，就是像希特勒和史達林的那種社會體制，但對「完美的社會」的期望，並非出源於人類邪惡的根性——事實上更且相反。大部份嚴重的「矯枉過正」，是理想主義者太富於嚴肅的道德信念而造成的。他們所要求的是「全然的善」；例如過去西班牙的「教徒法庭」（譯按：十五世紀在西班牙重建，以

對信仰不純者採用嚴厲制裁而獲惡名。）因為思想及宗教而引出的獨裁政治和戰爭，充滿了整部西方歷史，這也是下面這句話最好的註腳：「由於善意而鋪出來的路，却總是通往地獄。」

不止是愚騷者被引導到這條路上。實際上，對現有社會生活的不滿，大半是「智力」與「想像力」所引起的。缺乏智力跟想像力，就比較容易接納現狀和平和保守一些。所以反對文明——也就是說反對「自由」和「雅量」的必存事實，以及他們在各方面的結果，如：複雜，衝突，接受不可預測，不可控制的「改變」，多方面不安全等等，——就像我先前提到的，是由聰明的人類領導者中，最頂尖的一些人在開先鋒。這些人的才份造成了「菁英主義」，這對一般民衆平板的保守觀念是一種侮辱，在實際運作上，也一定排斥自由跟平等；但如此一來，那些頂尖的人物反而感到舒適，也認為更自然。

波普在攻擊開放社會的敵人時，把他們大部份歸屬到最高等的動機，小部份歸屬到最高等的智力。波普承認，他們所訴求的，是我們的「本性」中最好的一部份，以及我們內心深處缺乏安全保障的「感覺」

。在「開放的社會及其敵人」一書的上冊裏，波普用柏拉圖做最極端的例子：那是一個天才型的哲學家，他的政治理論，就是使「復古」的願望具體化。波普並在裏頭展開深且博的批評。在「開」書的下冊中，波普又認為馬克斯是最極端的哲學家，他自認為自己的理論上在建構一個「完美的未來」。（波普認為馬克斯主義跟烏托邦的思想不一樣，他的理由下面會說清楚。但他兩者一概反對。）處置這麼強大的敵人，尤其是馬克斯，他所用的方法，本身就已成就為他所談到的「方法論」中，最重要的一種方法。

翻開「爭辯」的歷史，即使是辯證的天才，如伏爾泰，他所用的方法，也不外是找尋對方的弱點，並且加以攻擊。這是很沒有益處的。任何一種立論，都有強有弱，而他們所訴諸操用的，顯然的也就是屬於較強的那一部份。所以攻擊他們的弱點，可能可以困惑那種理論的信徒，但絕不能真正摧毀信徒們所依賴的信仰。這是為什麼，一般人即使辯輸了，也很少改變觀點的理由。相反的，像這樣地輸了場子，甚至常常使得他們的立論點更堅強，因為他們會就此改進或拋開他們的弱點。往往兩個聰明的人，辯得愈久，兩

方面的論點，也愈無懈可擊，因為他們同時也在利用對方的批判，來矯正自己的立論。

波普對這種事的看法是顯而易見的。他的目標所在也是他最精彩的表现之所在，就是找出對方最堅強的地方，然後施以攻擊。事實上，在攻擊之前，他總想辦法強化對方。他很明白，既然對方的弱點有辦法拋棄，那麼對方所用的公式就有改善的餘地。在可疑的地方，他總是給對方善意的解釋，他故意漏過對方明顯的漏洞；然後，造就成一個最佳的辯論型式，再對準對方最強的主陣地，加以攻擊。這個方法，是心智上最高的發揮，也是驚心動魄的；而如果成功的話，也就是徹底的殲滅了。因為在這樣的批判之光照射下，失敗的一方，已無法重建可以被理解的任何論點，它最重要的資源跟資產，都已被暴露無遺了啊。

——這就是一種認為波普所加施在馬克斯主義身上的一切。以賽亞·柏林(Isaiah Berlin)就是如此評論。我必須表明：我不明白有多少有理性的人，在讀完波普對馬克斯的批判之後，還能是馬克斯的信徒？但這是我們稍後才要談的話題。

在學術圈裏，「開放的社會及其敵人」一書中，

最招爭議的是攻擊柏拉圖的那一部份。太多的攻擊是外行的。我聽到不少這樣的話：「開」書的上冊，主要是在批評柏拉圖；波普很蔑視柏拉圖的「哲學家身分」，但他已經遭到全然的駁斥。羅納·里維孫（Ronald B. Levison）那本精、大而且很學術性的書「爲柏拉圖辯護」，裏頭也有類似的話。（一九六一年，「開」書第四版波普附上了對這部書的答辯。）這些都是沒什麼道理的。波普很明白地形容柏拉圖：「永遠是最偉大的哲學家」，並且最親切、絕無諷刺意味地說他：「具有無以匹敵的智慧」。事實上，他的確認同懷德海（Whitehead）的那句斷言：所有的西方哲學，不過是在替柏拉圖作註腳。批判柏拉圖並不是主要的目的。當里維孫這麼寫的時候，他就描述得很公允了：波普攻擊柏拉圖，是出於他正面的信念的（消極性的）另一面。這個正面的信念，轉動着他的整部書。他是相信：最偉大的改革，就是從「閉塞的社會」改進到「開放的社會」。所謂的『開放的

社會』，就是國家提供一個相互保護的架構，個人生活於其中，享有自己的自由，同時也尊重別人的自由。這個社會，由於事事用負責且理性的態度做決定，更富人性及理性的人類生活，於茲可以不斷地增長。不但沒有「全然地駁斥」波普對柏拉圖的批評，里維孫甚至在結論時，同意波普所說的最重要的一部份：「首先，也是最重要地，我們同意——以波普的說法，柏拉圖的確建議『封閉』他們的社會——如果封閉的社會，就是意味著將一般人『類別』化的話……：韋伯（Webster）對『極權主義』曾經下過定義，我們對『獨裁政治』的概念，一般也都是由韋伯的定義而來。但如正確劃分的話，柏拉圖的政治理想，可以說在各種不同的『獨裁政治』中，是很不一樣的一種。但『政府削去了私人判斷和公衆轄治之間的分野』——就這個意義而言，如我們早先所同意的，我們可以謹慎地稱呼柏氏理論爲『極權的』。」

（上）